

“第三条道路”的解析与启示

张素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44)

【内容摘要】“第三条道路”是在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这个时代发生的诸多变化与“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条道路”实施十多年来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它的理论仍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我们需对之加以客观分析,以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借鉴。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 理论 实践 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11-0053-03

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第三条道路”不是什么新名词,20世纪曾出现过许多版本的“第三条道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就被称为是介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民族独立国家提出要走既不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依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间发展道路,如阿根廷庇隆的“第三立场”、印度尼西亚赫鲁的“中间道路”学说;1951年社会党国际提出要进行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欧洲共产主义”号称要走第三条道路,运行半个多世纪的“瑞典模式”也曾被称为第三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国家悄然兴起的新的“第三条道路”,与这些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的内涵是不同的,它的提出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思想和两种制度的冲突,也不是针对所谓改良社会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而是针对资本主义内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意识及其政治运作模式。1980年以来一直得势的欧洲保守党政府,此时纷纷倒台,而长期以来处于衰落之中的社会党却呈整体抬升之势。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会党人同时在四个主要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组织政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粉红色的欧洲”。左翼思潮回归,既有左翼经过自身的改造和包装重新被选民认同和接受的因素,也有此前执政的右翼政党政策相对失败的因素。

“第三条道路”是在后冷战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这个时代发生的诸多变化与“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1.全球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终结为各种思想和探索的兴起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结束,合作与对话取代了对抗,在全球范围内,

谋求发展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特别是各大国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这为寻求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合作创造了现实的国际氛围,对“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2.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资本外逃、经济增长率下滑、失业率上升等,同时其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的“三高”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并使各种社会问题加剧。这种情况表明,传统的西方“左”翼或“右”翼思想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今世界西方社会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打破传统理论界限、寻求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已是大势所趋。

3.西方各国中间阶层的扩大为“第三条道路”理论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革,使产业队伍的构成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相对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中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中产阶级遍布各行各业,他们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他们普遍持有“求稳、怕变、怕乱”的心态,厌倦党派之争,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为争取这些选民,欧美等国纷纷推出迎合中产阶级的政策方案,修改带有明显“左”或“右”色彩的政策主张,走第三条道路。

4.欧美各国长期积累起来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历经一段时期的经济衰退后,西欧经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步入低速增长期,同时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据统计,1996年至1998年,欧盟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左右,其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以上。由此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经济发展乏力,社会贫富分

* 作者简介:张素蓉(1976-),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化加剧,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空前严重。实践表明片面地强调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都不可能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建立能够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的新理论和新体制,而第三条道路正是这样一个新尝试。

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政策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理论家吉登斯把“第三条道路”的价值概括为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七个方面。这些价值观念,实际上都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念自由、公正(平等)、团结(互助)衍生出来的。与此相适应,他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纲领”,它包括:激进派的中心、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世界性的国家、世界性的民主这十个方面的施政纲领^[1]。

1998年社会民主党或中—左派联盟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等国家执掌了政权。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除了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外,全部是左翼政党单独执政或参政,出现了继20世纪中期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又一次辉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倡导“第三条道路”的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对自由、公正(平等)和互助(团结)等基本价值观念做出了创新解释,摒弃了延续多年的“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具体政策取向上大胆吸收保守党的做法,使其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第三条道路在各国具体的政策主张具有很多相近之处,主要有:

1.经济上建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重新审视政府功能和市场作用,界定政府职能与市场运行边界,反对片面地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或自由放任。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手段,建立“有活力的现代经济”,使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状态,实现“新经济政策”指导下的高速经济增长。

2.政治上提倡回归公民权利与复兴公民政治信念。打破传统左右两分法,改革封闭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团结各种政治力量,扩大制度的包容性,实现政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协调中央与地方的政府权力,缩减中央权力,扩大地方权力,增进政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提高行政效率,推进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复兴人们几近泯灭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念,发挥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作用,为新政府执政奠定良好的民众基础。

3.社会上倡导权利与责任统一、权利与义务统一、机会与责任统一、个人与社会统一。改变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过分张扬个性、自由发展的倾向,改变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和冷漠无情的社会风气,构建更加协调、更加平和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福利上实施以开发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积极福利政策。抛弃传统无差别的消极福利政策,弱化对贫困人口予以直接经济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重视对需救济对象的人力资本的挖掘。国家提供有利于提高人们文化水平和财富创造能力的教育与培训机会,提升人们的劳动素质和就业能力,为贫困人口摆脱贫穷创造良好的经济与政策环境,在效

率与公平之间,实现良好平衡。

4.国际上主张国际社会全球化治理。历史迈入全球化的进程后,国家权力与国际权力边界愈益模糊,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次落伍,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关系。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全球化治理机构,制定统一的国际运行规则,协调民族矛盾和各国利益,谋求各民族国家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全球化问题的挑战。

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实质来看,它是要解决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但它提出的方案却试图在抛弃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弊端的同时,将两者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即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既让经济充满活力,又实现社会的团结一致。它的设想可谓富有创见和具有现实意义,但它的理论仍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

1.理论基础的游移导致对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背离。吉登斯指出了传统意识形态存在的缺陷,但他在说服人们抛弃传统意识形态之前并没有提出能使人信服的全新意识形态结构,他只是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一番修补。“第三条道路”遭到许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信奉者的猛烈攻击,如爱德华·赫曼在《背叛的政治》一文中指出,“这一系统性的背叛是对任何民主实质的蹂躏”,同时,这也是对不断上涨的公众愤慨和愤世嫉俗以及日趋下降的投票率的一个重要的注解^[2]。从这一点看,“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带有过多向现实妥协的色彩,这大大地减弱了它作为一种理论所应具有的生命力。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传统纲领和原则,工党在事实上也失去了自己传统的选民基础。工党在2001年和2005年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从而实现“三连冠”,连续执政13年,并不是因为“第三条道路”真的是一条新的出路,而是因为工党在其执政初期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比较成功。

2.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第三条道路”所涉及的经济策略中,除了信奉市场的重要作用以外,并没有提出新的经济理论作为其政策前提。相对于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来说,“第三条道路”因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而显得单薄,减弱了其作为一种亟待复兴的意识形态所应具有的影响力。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在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下,国家不仅必须保证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分配,从而保证社会的凝聚和团结,并赢得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它还必须保证资本主义经济持续不断地增长,即保证用来分割的大蛋糕在总体上不断增加。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而在这个领域,工党没有任何突破,几乎完全照搬了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3.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第三条道路”从本质上说是“盎格鲁——萨克逊”方案,深深地刻着它得以产生的社会的烙印。其主要理论家吉登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英国工党的政策转向,他的改革方案完全以英国社会为参照系,根本就没有顾及欧洲以外国家的发展和变迁情况,这就为“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新政治理念的普适性打了折扣。

三、启示

“第三条道路”在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得到了选民的广泛支持,左翼势力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但欧洲的政治格局变幻莫测,目前社会民主党人又处在欧盟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之外。“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的选举胜利是妥协和限制相结合的产物。无论是英国新工党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未能针对变化建立起持久的联盟。在2005年的大选中,这两个政党的得票都比1997年和1998年减少了数百万张,两党也都在地区性选举中频频失利。大量传统工人阶级中的支持者对英国新工党和德国社民党丧失了信任,很多人不参加选举,而少数人则认同了其他宣称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2008年底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也遭到了重创,再加上工党政府内阁成员的一系列丑闻,在2010年大选中英国工党败下阵来,13年的“第三条道路”之旅不得不告一段落。

尽管“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改革战略它在现实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对当今世界的革新浪潮具有推动作用,对我国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1. 发挥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各自的长处,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条道路”认为,应该分清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各自的作用,凡是应该归国家宏观调控的,国家和政府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对于具体的经营环节,则应该放手让经营者在市场中经营,国家不应过多干预。吉登斯说:“我们从……老式社会民主的中央集权的狂热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即使为了理想的社会目标——国家权力也可能会变得毫无生气和官僚主义。”^[1]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既存在贫富悬殊的矛盾,也存在就业压力大,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对此第三条道路很多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的具体政策,对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关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第三条道路提出将国家包办一切的安全网式的福利国家改为社会投资型国家,调动社会各方面投资社会福利保障的积极性,同时将福利与就业和教育培训结合起来,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济蓬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协调,即“高增长、低就业”的问题,我们可从“第三条道路”中得到不少启发。

3.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证。“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的立场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一个政党应该注重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4]。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各种具体利益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间的摩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此,我们更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亲密合作和政治协商,协调各党派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促进社会各阶层间的团结合作,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

4. 积极投入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第三条道路的外交政策中包含新干涉主义的思想,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强调国际合作重要性的一面。第三条道路对国际合作的重视和强调可以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提供借鉴。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国际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调的发展。为此,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国际体系中来: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联合国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使自己的意见能够反映到国际规则之中,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到国际环境保护、国际能源合作、国际军备控制和国际贸易合作等领域中,成为国际关系变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决策者,而非消极的旁观者。

参考文献:

- [1][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4.
- [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 [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57.
- [4]郭志俊,刘兆.第三条道路及其对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06(3):54.